

晚清

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

赵雅丽◎著



WANQINGJINGSHI
NANCHENGZHENGZHIWENHUAYANJIU

晚清年代，生活在京师南城以言官清流著称于世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是在怎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活动的？他们有着怎样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心理，以及有着怎样相应的政治选择和交际网络？他们怎样和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晚清几代君主们的政治决策，从而影响着晚清政治格局和政治文化的演变轨迹？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晚清

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

赵雅丽◎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 / 赵雅丽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506-0797-2

I. ①晚… II. ①赵… III. ①政治文化—研究—北京
市—清后期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73340号

书 名 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

著 者 赵雅丽

责任编辑 李相东

选题策划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大兴区黄村镇李村 邮编: 102600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38

字 数 430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797-2

定 价 6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10-83670220)

本书提要

本书采取将晚清士大夫文化和京师南城（主要是宣南）社会环境相结合的方法，以同光清流派为中心，分析南城以中下层京官为主体的政治文化模式及其流变。本书讨论的重点：一、晚清政治文化的理论来源、运作模式及其与南城特定地域环境的关系；二、横向探析同光清流派在民族危机日迫、内部病症深重的背景下，议政氛围日浓，形成以儒学德治为核心理念，应对危局的种种建言及其政治运作；三、纵向考察同光清流派分别在当时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政治心理、政治观念及其自身的历史命运；四、清流主干张之洞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清流本色及其变异。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关于研究对象的几点思考

- 一、政治文化界定 001
- 二、南城政治文化考量 004
- 三、宣南文化形态的变迁 008

第一编 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

第一章 翰詹衙门的功能及其属员的政治能量

- 一、起源及历史沿革 013
- 二、清代翰詹衙门的功能及清要官员的政治能量 026
- 三、清要官员的地域优势及其对儒学经世的认同 028
- 四、小结 033

第二章 京师南城的区域文化环境

- 一、“士流题咏率署宣南” 035
- 二、宣外名宿分布概况 053
- 三、京南士人生活素描 068

第三章 王朝危机与宣南议政风气的萌发

- 一、嘉道社会危机 091
- 二、议政风气的文化来源和宣南地域环境 097
- 三、议政风气的萌动：以洪亮吉“极言时政启”为例 106
- 四、议政风气的扩展：以黄爵滋“禁烟疏”为例 126

第四章 咸同以降南城士人的交际网络与信息来源

- 一、咸丰朝的朝士派别与法源寺聚会 135
- 二、同光朝士人的交际网络与信息来源 138
- 三、清流人士的互援 149
- 四、各种社交圈子：以李慈铭为例 152

第二编 横向探析：建言种种和政治参与

第五章 时人论清流的史料与史识

- 一、辜鸿铭 163
- 二、胡思敬 165
- 三、瞿兑之 167
- 四、刘成禺 170
- 五、郭嵩焘 171
- 六、其他 172
- 七、小结 175

第六章 同光两朝清流派建言种种

- 一、整顿吏治 179
- 二、修德除奢 182

三、延揽人才	185
四、州县久任	186
五、广开言路	187
六、寄养宗室	188
七、改革科举	189
八、应对洋务	190
九、涉外强硬	197
十、小结	198

第七章 清流群体的政治纳用和政治参与

一、清流群体的政治纳用	200
二、形形色色的政治参与举例	220

第三编 纵向考察：同光两朝重大事件中清流派从议政到干政的发展势头

第八章 罢黜议政王奕訢

一、辛酉政变后慈禧与奕訢的权力砝码	234
二、慈禧提升名儒清流	240
三、蔡寿祺劾恭王始末	242
四、小结	249

第九章 京师同文馆之争

一、增设天文算学馆引发论争之症结	255
二、天文算学馆之争及中枢的折中与制衡	262
三、清议的先声	277
四、小结	292



第十章 天津教案中的清议与廷争

- 一、讹言：天津教案的导火索 ■ 298
- 二、直隶总督曾国藩处理津案的困境 ■ 302
- 三、清议与廷争 ■ 306
- 四、小结 ■ 310

第十一章 中俄伊犁交涉：清流派的集体亮相和行动

- 一、主战、拒约、改约的思想基础 ■ 315
- 二、应对海防、边防双重危机交错的讨论 ■ 320
- 三、伊犁交涉：清流派的同调驳击 ■ 325
- 四、伊犁改约：民族危机下的激情与自信 ■ 349
- 五、小结 ■ 353

第十二章 丁戊奇荒中的廷议：清议群体联合发言势头的扩展

- 一、京师情形：百物腾贵、灾民载道和权要奢靡的强烈反差 ■ 357
- 二、拈香祈雨的“罪己”仪式 ■ 360
- 三、科道言官的建言：荒政恤民 ■ 363
- 四、翰林清流的吁请：广开言路、遇灾修省 ■ 367
- 五、清流派与地方政要的较量 ■ 370
- 六、翰詹科道联合发言的势头 ■ 378
- 七、“除奸邪”与开言路主张的激进化 ■ 393
- 八、小结 ■ 404

第十三章 中法战争：清流派发言的新一轮高潮

- 一、不即不离：宗藩观念下能力与道义两难抉择 ■ 407
- 二、和战两歧：清流派主战的清议推动 ■ 411
- 三、联合黑旗军抗法的清议努力 ■ 420

- 四、弹劾枢臣与甲申易枢 423
- 五、“李福协定”：“清议皆击李鸿章” 428
- 六、清流骨干的擢升与清流群体的星散 438
- 七、小结 447

第十四章 铁路之争：清流派与洋务官僚的求强趋同

- 一、抵制洋人筑路 449
- 二、李鸿章的“有倡无和” 453
- 三、议修清京铁路的论驳 457
- 四、开修津通铁路的台谏舆论 465
- 五、“下铁路之诏”：“青牛角”张之洞的助力 481

第十五章 清流派干预内宫权力的尝试

- 一、安德海案 488
- 二、阻修圆明园 494
- 三、干预帝统“家法”：“孤臣”吴可读的“尸谏” 506
- 四、庚辰午门护军太监斗殴案 522
- 五、小结 527

第十六章 以权力为中心：内宫对清流的支持与压制

- 一、内宫对清流的支持 529
- 二、“甲申易枢”后内宫对清流的压制及议政声音的
流散 543
- 三、小结 550

代结语：清末教育改革主角张之洞：清流本色及其变异

- 一、新政上谕解析：西方富强之源纳入儒学的论述 555
- 二、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清议风格解析 558
- 三、科举渐废：力求稳健的改革思路与举措 568

四、“保存国粹”：中学与西学并行的新体认 577

五、小结 581

附：参考书目 585

后记 597

绪论：关于研究对象的几点思考

选择本项研究，有很多困惑。在逐渐搜寻史料和不断反问中，有些体会，虽然零零散散，但毕竟体现了努力思考的过程。

本书主题选定在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研究对象是政治文化，承载这一文化的是当时京师南城（主要是宣南）一带区域范围有限而社会关系、思想状态都非常复杂的士大夫群体，尤以清流言官著称于世。对这个主题在理论上需要层层界定，需要层层剥离，最后凸现主题。

要做到以下几点，以清流派为中心研究南城政治文化，在文字背后有这样一些概念必须清晰：

1. 什么叫政治文化；
2. 什么是中国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这样一个政治文化，它的传统政治特色是什么；
3. 晚清政治文化界定；
4. 最后落实到京师南城以清流言官们为主体的心理、言论、行为所反映的政治文化内涵的界定。

一、政治文化界定

了解界定，并非是罗列政治文化的各种概念解释，而是如何经过分析和综合，得出一种较合理的、能勾画本书主题的解释。政治文化是政治学、文化学分别交织而又分别派生的次生概念，国际上相关学派论述至少有三十多种。我们要依研究对象的概念考虑我们研究的界定。时下，之所以出现不同解释，原

因之一似乎是我们可以从政治学、文化学两种意识角度来解释政治文化。

我们界定的政治文化，首先重视从政治学角度的考察。政治学是项从事历史学勾勒的主干，而后以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方法来支撑这个主干，试图在历史的纵向发展脉络与横向的逻辑结构中，通过结合比较来展现问题。本书倾向于如何从政治学支持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虑政治文化，得出如下大体上的界定：一个社会的特定政治集团为了维系一种良性的社会秩序与目标而形成的本集团在思想倾向、政治倾向、价值观念、利益准则与行为规范上的文化的认同。简要地讲，就是该集团的广泛的政治心理和宏观的政治理念的统一。

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以“清流”为群体的政治文化究竟是什么？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即历史大背景；二是这个清议群体的发言基调，特别是其角色地位；三是南城地区。以此要素可以把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前的宣南政治文化特点概括为：集中居住在南城的以中下层京官为主体的士大夫群体（以清流言官为主），出于内忧外患，即出于对内部危机和外部入侵的焦虑，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缅怀，而得出的对大清帝国复兴和重建的思考，特别是基于他们自身角色地位所规定的那种由政治参与而构成的意识与行为、由政治参与来影响政府决策可能性的期待感。以此为方向，其中包含了几个要素：

1. 大背景要素：内忧外患的焦虑感、传统文化的缅怀、再创帝国的期待，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的共同特点，但有一点不同，就是由于当时危机的深化，这种焦虑感和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感较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要深重得多。

2. 他们是京官群体，是以宣南地区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带为依托。

3. 他们自身的角色地位是中下层京官，由于其政治参与而可能影响政府决策，并把政府决策转化为政府行为，他们对此寄予相当大的期望。这种把政府决策转化为政府行为可能性的角色定位，规定了他们的意识与行为，其核心意识可以简化为“以德救国”，即以文化道德来拯救国家和社会的迫切感超过任何过去一个时代。这种文化心理和意识，区别于偏离京师的口岸或其他地方上的经世派，观念上也不同于洋务派。当然在质上又不同于戊戌维新派，他们只是积累了戊戌变法中某些发言因素。本书拟从这样几个方向，从这几个假设，在限定范围内来勾勒资料和研究。

对这样的政治文化，对清流的势头的研究，应该讲还有继续拓深和细化的余地。在既往关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前沿成果中，大体有两种路向来勾画

这一时期的思想地图。或者是从时代属性，即从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到戊戌维新派来铺叙精神文化发展的脉络，或者是从思想属性，即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来界定当时的思想分野。

这两种路向都有许多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但对清流群体的分析，则似嫌薄弱。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过去在诠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历程时，在主观上勾勒的思想地图比较简单化。怎样从多脉络、多空间的总体研究中去把握京师清流和地方经世、口岸洋务等等思想的关系时，似乎还缺少清流派的位置。有一批学者已经提出了清流党转化为洋务派的观点，如认为张之洞由保守转化为洋务，或认为他属于务实的洋务派等等。本书期待这种研究由点到面地继续深入。

二是有些学者只关注了清流派的一种品格，即他们的封建性和保守性，而未从政治文化角度对清流进行全面界定。著名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将“清流党”列在“排外主义”一目，说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国内有些学者也曾对他们下过实质上是封建顽固派、保守派，轻言战事而没有对策的评语。有的著作大约是因为用这种评语不大好处理张之洞，于是把他从清流名单中略去不提了。

清流的思想脉络与封建主义、保守主义自有相通之处。清流派无疑属于维护大清王朝的营垒。问题在于当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深刻的政治危机、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并由此引发了各种复杂的问题时，应有一个超出非此即彼的评判标准，看到他们这些人应对危机的思路与发言中的某些合理性成分，恐怕不能用保守、激进来考虑，应该不是非此即彼的评判标准所能解决的，至少要考虑能够进行深入的剥离与考析。

由于人们主观思想地图的简单化，人们研究清流集团对其守旧性的简单界定，使过去研究过于简单。清流党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民族保守主义立场（《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批评的“强调中国的道德力量”的立场），实质上是晚清年代当中国传统文化遇到外来异质文化空前的压力时，人们产生的一种重新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唤醒和重建本土文化的急迫感。当时，无论是京师和地方，也无论是精英和大众，都在外部冲击下进行了多种重建本土文化的努力（有的学者称之为“文化本土运动”）。尽管这些都属于不成熟时代的不成熟的努力，但清流们的封建性、保守性，和民国初元遗老遗少们的封建性、保守性，是两回事。



因此，文化保守中应当包含为了文化保守而转换文化的含义，包含将传统文化向当代文化转换的探索。不应只顾及一次思想论战，未考察全部思想进程中的脉络变化，认为清流无非是同文馆之争或铁路之争的负面一方等等，这样，既不能涵盖当时整个言官群体的发言脉络，又不能解释说明清流党首张之洞为什么会进行转化，不能解释张之洞思想特色始终保持一贯而前后发言为之不同的原因。

二、南城政治文化考量

地区文化与清流思想结合的研究，即将两者编织打通很困难。本研究拟以言官清要们的一个共同的政治行为模式来打通两者。清流派的政治文化，即对内忧外患的忧虑，特别是对自己特定角色地位，在这样基础上发生的特定的思想行为，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在当时整个一种政治框架前提下，形成一种由政治参与，经过几个环节，到形成政府行为的模式。他们的一个共同的政治行为模式的有力推行需要一个有利的地区为依托，一种能够既沟通中央又能沟通地方的文化圈作为支撑和依托，而这样的一种依托会强化这种政治行为模式，亦即没有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依托，这种模式的力度会降低，或者说面貌会不一样。而这种政治行为模式在当时不仅是由整个社会环境，也是由微观的具体环境所规定的。据此，本研究力图通过以下几点模式来做出史实的勾勒。

1. 政治参与，即学者们常说的晚清士大夫政治积极性的高涨。
2. 这样的群体政治参与怎样力图影响或变成政府的决策。
3. 由政府决策怎样变成或落实到一种政府行为。
4. 由政府行为达到清流派的一种初步的、在原有框架之下逐步变革的目标。

这样，在达到的预设目标里，清流们得以分享其既得利益。这样的一种政治行为模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存在，在当时君权之下扩大士大夫的群体参与，只有这种模式才可能行得通。

这样一个模式，需要什么样的地区文化才最有利，需要什么样的情境下可能较为有力地推行？

1. 它首先是派系政治。这里的派系政治不含贬义，它指的是政治同调的人要结成派系，形成一个小圈子，或者按学术语言讲是同调的横向联合。京师

南城地区尤其是宣南地区，京官居住那么集中，恰好能为派系政治的形成提供有力的地域前提。这种情况至少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京师南城地区，它是都市的边缘，城市的乡村，它有利于贴近权力中心去结成各种横向的同调联合，可以结成各种圈子。二是既然它地近京师内城，地处宫廷的边缘，则它可能有力地影响大员，甚至是皇帝。前清流中最重要的大员是军机大臣、堂官兼总署大臣的李鸿藻。据陈宝琛日记记载，他自己曾见到李鸿藻两次，但是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等与李鸿藻却经常保持联系，这在李慈铭日记中也得到印证。伊犁事件、中法战争等相关材料中也有记载。慈禧太后曾单独召见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这样的横向联合形成的基调可能直接地影响中枢。因此，对于这样的横向联合，居住条件十分重要。

这样一种横向联合的有利条件，可以通过细节描绘呈现出来。因为他们居住相近，一种重大决策的过程里可以说是互通声气。典型的是如本书下面的章节里写到的午门护军殴打太监等案例。在两个最主要的护军案奏折里，张之洞、陈宝琛经常联系的是张佩纶。至少有四件通信来往材料可以证明他们商议的细节，如怎么上奏，哪些先上哪些后上，是奏折还是奏折奏片一起上，等等。其他也如此，如谁上奏折，谁去呼应，谁去推动，谁讲什么话，互相之间通常都先有议论。这样一类议论，是一种集体性的政治参与，目的是为了影响中枢，影响政府决策与政府行为。至少京官们集中居住的一种条件——为其他士大夫群体不能达到的有利条件，在宣南地区形成了。

2. 这样一种地区有利于形成清要们公众议论的若干空间。具体而言就是当时的寺庙、陶然亭，等等，最重要的是松筠庵。它是明嘉靖朝著名的谏臣杨继盛故居，杨因两度上书弹劾权要被诛，因而松筠庵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符号，一种敢于直言上奏、敢于据死力争以保卫皇权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符号。这样，因为居住条件的方便，一些舆论空间形成了。在这一有利的舆论空间里，出现了一系列的集会，如龙树寺、法源寺、松筠庵、陶然亭的各种集会等等。这样一些“政治俱乐部”的形成，都应该是围绕这个模式进行的，即从集体性的政治参与出发，来达到预设的政治目标。

3. 南城的文化氛围容易强化这批清要们的基调，即在审美上、情感交流上的基调，如慈仁寺书摊庙会、后来的琉璃厂的氛围，等等。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中描述清要们各种爱好，如金石、藏书、鉴古、碑文及其他爱好，虽然清流们的学派不同，爱好有别，但均经过琉璃厂这类集市庙会形成了一种

相互联系的结合点，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从不同角度的一种追求。这样一种爱好实际上折射了他们的理论背景与政治基调。

最后要考虑的问题是，正如一些论者已注意到京师南城这样一种地区与省市地方的联系，与口岸的联系，特别是与地方上具有改革倾向的精英们的联系。这些联系，是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的。如清要们被放出去做学政，从而与地方士绅有广泛的联系。重要的清要们基本上都外放过。同样也可以找到地方绅士一些告状的材料，不是直接送到督察院，而是递到了清要们手中的例子。潘祖荫曾因违制而受到过处分。这样一种联系，它作为一种文化圈与另一种文化圈的联系，比较方便。这样的联系，不仅在于很多人被派出去，而且还在于更多的人走进来。在会馆里，在三年顺天乡试与北京会试里，士子如林，这些准备入仕的读书人，与京官们之间形成了复杂的联系。还有应诏进京的官员，多住过法源寺等寺庙或会馆，这样一些人也形成过联系。当时记载有很多公宴，即京官清要们出份子宴请外来进京的人。公宴的性质不同，有人为了打秋风，收红包，因为京官当时多清苦，但也常见各种政治联系。如陈宝琛与淮军名将刘铭传的联系，他为刘起草的建筑铁路的奏折就属于后者。这样几个条件，凭借的是京师南城地区的一种文化资源优势。这一优势有利于上述政治行为模式的推进，对从政治参与到政府行为起到很大作用，因而在研究考察上，可以将清流思想与区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方法上可以再做探讨。在这样一个政治行为模式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的几个环节中，最重要的环节应该是政治参与，因为其他问题要依靠皇权，要依靠中枢的决定来管理。这几个条件首先都是从怎么有利于以集体性政治参与来考察与审视的。同时在这种中国晚清士大夫行为模式的变迁里，也积累了政治参与的变量，即政治参与的深度、政治参与的范围、政治发言的内容等等，这样的一种变量过程中酝酿着后来戊戌变法时的一个新的理论脉络的质变。旧脉络里有很多新因素，尽管京官们当时不可能自觉意识到这些新因素，但史学研究者可以靠后知之明，通过对思想和事件的解析，从京官们的发言动机、发言内容、发言氛围、发言涉及的问题，等等，描摹出这一思想脉络的发展逻辑，其中有很多要素是通向“公车上书”的。从这样一种动向里就有可能找到对戊戌变法起源做出更有历史感的解释。

这样一种士大夫清议的政治行为模式，为什么不能传下去？慈禧为什么要解散“清流党”？在史书上一般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释，如慈禧与奕訢的权

力之争，慈禧需要清流们的言论对奕訢权力加以制衡，但当奕訢权力被削弱，变得不那么重要后，清流存在的必要性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在清流考察上，清流的兴起、散落，从历史叙述上，我们形成以上想法。除此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清流命运与奕訢权势的关系并不密切。从清流派的奏折看，他们中的多数人也并不反对奕訢力主的洋务。更深层的原因要考虑言官、清要们政治参与所发生的变量。这批人好言弊政，有一种要求体制变革的冲动，这一种冲动和当时大清帝国内部体制的僵硬性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不能为中枢所容纳时，这样才引起了表面看来似乎是清流人才的沉寂与星散。

“清流”讲究的是以德政人心作为拯救国家和社会的基点。“德治”实际上是把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手段或主要手段，用政治与道德二者的协调来达到稳定与持续统治的目的。在当时清流的奏折中，它还是儒家传统的思路，亦即一种以民本思想为基础的“重民”视野。首先讲的是选贤与能，选出道德高尚的人、清正端方的人、有深谋远虑的人，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选贤与任能需要有一个恰当的选拔人才的机制，要求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选拔官僚的制度，也就是理想化的表现士大夫政治的科举制度。再接下来，选拔出来的人首要的标准就是德，清廉是准入仕途的核心。其次是应对能力。这样一套东西落实到更广阔的执政层面上，即在社会上要考虑到选择人才的广泛性与怎样找到选材标准的革新。这样一些传统的治国理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经过多次内忧外患的冲击，逐渐增加了新的标准、新的内容。如在选贤任能的标准上，要求选拔洋务人才，在考虑如何把洋务人才选拔到官僚制度中时已经考虑并提出了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在思考以德治国时，增加了经世的内容，不仅是理学经世，还增加了应变能力的内容，等等。这样一些要素，可以说是在旧传统框架内对政治文化在理念上的扩充。

这样一些“兴利除弊”的要素，确实在当时触及了中枢的弊病。这样一些呼声在高涨时，不能为慈禧所容纳。在最后，慈禧申饬清流时最重要的理由是在用人标准上干预了她的权力。这样一种说法也可以反衬出当时清流们在其传统思路里增加了新的内容。从政治心理而言，恐怕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慈禧也好，军机大臣也好，六部堂官们也好，内阁大学士也好，他们未必不觉察清流所提出的这些弊病，仅仅用封建顽固派、拒绝一切新的变革这样一种笼统的说法是解释不清楚的。封建顽固派不在于不了解弊病，而在于他们恰好是旧政弊病的最大受益者，哪怕是对当时一些最糟糕的东西加以变革，也会直接触及